

1930年沈兹九在右翼期刊《长风》的文学创作研究 ——兼谈韩人题材小说《活的机器》

张琳*

目 录

1. 绪论
2. 右翼期刊《长风》与左翼文人沈兹九
 - 1) 《长风》的民族主义文艺倾向
 - 2) 沈兹九在《长风》的文学创作与政治倾向
3. 从《活的机器》看沈兹九对在日中朝劳工的关注
 - 1) 浙东华工赴日的理由与在日境遇
 - 2) 关东大地震中被虐杀的朝鲜人与被“误杀”的中国人
 - 3) 新发现的韩人形象金桂生
4. 结语

中文摘要

1930年沈兹九在右翼民族主义文艺期刊《长风》发表了7篇作品，主题都是民族主义文艺常见的反帝、反共、批判社会现象、颂扬历史人物等。这些创作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并试图寻找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出路，同时也表明当时她的政治倾向尚未向左转。其中以真实事件为基础创作的小说《活的机器》描述1920年代浙东劳工和朝鲜劳工在日本受到资本家的严酷剥削以及在关东大地震后遭到虐杀的悲惨境遇，表现了沈兹九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底层劳工的人文关怀，也为惨痛的历史事件留下了文学记录，具有文学与史料的双重价值。同时，这篇小说塑造的韩人形象金桂生是以往韩人题材作品研究中从未被提及的。新发现的在日朝鲜劳工金桂生的形象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中韩人形象的图谱。

* 용인대학교 교양교육원 부교수

关键词: 1930年代右翼文学,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沈兹九, 韩人题材作品,
《长风》半月刊, 右翼期刊, 《活的机器》

1. 绪论

沈兹九¹⁾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家, 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著名女报人。她一生主要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和报刊编辑, 文学创作并不多。1930年, 沈兹九在国民党民族主义文艺期刊《长风》上发表了7篇作品, 目前为止由于右翼期刊长期被“遗忘”和埋没, 这些作品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比较特别的是其中两篇还带有明显的反共倾向。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左翼文人, 沈兹九在右翼期刊上的创作以及她当时的政治倾向, 是值得探讨的。这对全面地了解和研究沈兹九的生平、精神世界以及1930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作品中小说《活的机器》尤其引人注目, 这篇小说描述了1920年代浙东赴日华工在日本苦难生活的血泪史, 是以真实事件为基础进行的文学创作, 既具有文学价值, 又具有史料价值。特别是小说中还出现了在日朝鲜劳工形象, 这是以往中国现代文学韩人题材作品研究中从未被提及的。

本稿拟通过文本分析, 史料对照的方法, 以《活的机器》为中心, 整理分析1930年沈兹九在《长风》的文学创作, 探讨她当时思想右倾的原因以及日后向左转的契机, 还将对新发现的韩人形象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

1) 沈兹九(1898-1989), 原名沈慕兰, 浙江德清人, 1919年毕业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21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艺术系求学。1926年秋学成归国。1934年主编《申报》副刊《妇女园地》, 1935年创办《妇女生活》杂志。1949年任全国妇联宣传教育部部长兼《新中国妇女》月刊总编辑。同时任民盟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金平, 《沈兹九的故事》, 石家庄: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5年, 第1页参考。

2. 右翼杂志《长风》与左翼文人沈兹九

1) 《长风》的民族主义文艺倾向

《长风》是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开展以来，继《前锋周报》《前锋月刊》《草野周刊》《开展月刊》等杂志之后，在南京创办的一份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右翼刊物。该刊为半月刊，1930年8月创刊，1930年10月15日出至第5期停刊。由长风社编辑，时事月报社发行。《长风》在创刊号上登载的《本刊的使命》中明确点名了办刊主旨：“本刊负有两个重大使命：一是介绍世界学术，二是发扬民族精神。”作者认为中国民族自鸦片战争以后国势渐弱，最大的一个原因即是民族精神的丧失。作者一面呼吁“海内作家和读者，与我们连为一气，一面赈济学术的饥荒，一面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与人类的压迫者——帝国主义作最后的决战。”一面又指出“共产主义者一味激起互恨的阶级意识，而抹杀互爱的民族意识，当然不是我们的朋友。”²⁾由此可见，该刊致力于宣扬民族精神，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同时表现出对左翼文学的强烈敌意，明显在呼应民族主义文艺。与其他民族主义文艺期刊相比，《长风》比较特别的是提倡学术，这与该刊实际主编徐庆誉³⁾是一位学者型文人不无关系。毕业于湖南省立法政专科学校的徐庆誉1923年由基督教会资助，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哲学。回国后供职于国民党政府，同时一直在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1920,30年代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涉及的领域有哲学、政治学、美学等。

2) 《本刊的使命》，《长风》第1期（1930.8）第1-3页参考。

3) 徐庆誉（1893~?），湖南浏阳人，陆军中将。毕业于湖南省立法政专科学校。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作品有《易的哲学》《美的哲学》《徐庆誉论文集》《中国民族与世界文化》《现代政治思想》《新生活与哲学思想》等。徐庆誉曾留学美国，后任蒋介石秘书、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湖南省第一、第十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第二绥靖区秘书长、济南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中将秘书长等职。1948年济南解放后去香港。后定居美国。历任上海光华大学、香港大学、山东齐鲁大学教授，美国国会顾问委员会国务顾问，美国安全理事会全国顾问委员会委员。任宝根。《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征略》，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316页。

《长风》有三个栏目：专论、文艺和杂感，该刊在强调发展学术的同时，也注重文学创作，是“一份理论和文艺并重的综合文化刊物”。⁴⁾杂感栏只出现在1-3期，所占比重也不大。主要刊载一些简短的随笔，内容有人物评论、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批判等。

专论栏中刊载关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理论文章。主要撰稿人有：徐庆誉、朱经农、华鼎彝等。理论文章的内容比较丰富，既有对国内政治和文化问题的探讨，也有对国际政治形势的介绍，还有一些比较中西文化的论文。第4期“青年问题专号”，在专论栏目中集中刊载了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和人生指导的8篇论文，针对当代青年的困惑和烦恼有的放矢地提出了不少有建设性的建议，对指引当代青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还受到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的认可。⁵⁾

文艺栏中刊载的文艺作品各体兼备。主要作者有：兹九女士、徐志摩、静宇、陈曼若、息影、李青崖等。文艺作品主要主题是表现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另外也有不少抨击普罗文学和共产党的作品。与同时期的其他民族主义文艺杂志相比，《长风》上刊登的这类作品数量虽然比较多，但是并不激进，态度相对相当温和⁶⁾，对普罗文学和共产党的批判还仅仅停留在思想斗争阶段。内容大多是描写纯洁的青年或者无知的农民被共产党诱骗，周围人通过劝解说教使他们认识到左倾思想的欺骗性和危险性，帮助他们重新树立三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信念。

4) 吴俊、李今、刘晓丽、王彬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上海：上海人们出版社，2010年，第77页。

5) “长风社自在首都成立以来，即将发行长风，以介绍世界学术及发扬民族精神为目的，该刊已出至第三期。该社以青年问题，极关重要，若不极谋解决，必使社会愈趋纷扰，兹为彻底研究起见，特将该刊第四期改为‘青年问题专号’。所有专论文艺，均为青年而发……此外尚有小说诗歌若干篇，亦皆与青年问题有关系之文艺，凡中国男女问题青年及各校学生皆不可不仔细阅读，该刊已付印，本月底即可出版，当此青年彷徨忧伤之时，有此物，中国学术界当开一新纪元。”《长风即将出版〈青年问题专号〉》，《中央日报·教育》，（1930.9.21）

6) 同时期其他民族主义文艺刊物上则刊登了不少激进的反共作品。例如李贇华的小说《变动》（《前锋月刊》第2期）半虚半实地描述了共产党劫掠村庄的恶行。廖江棻的小说《在旋涡中》（《华北月刊》第2卷第1期）则叙述了共产党武断粗暴地以阶级划分为标准，滥杀无辜的富裕地主，还有党干部利用职权诱奸村妇的情节。

《长风》虽然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期刊，但却算不上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先锋。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政治民族主义和官方民族主义的特征。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提倡民族主义来统一思想，用民族意识对抗左翼共产主义的阶级意识，从而实现对内消灭军阀，有效统治全国；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建立自主自决民族国家的最终目标。为此，民族主义文艺的参与者一方面致力于民族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另一方面努力创作了一些格调激昂的文学作品，鼓舞国民牺牲小我，为民族事业献身。遗憾的是与其他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文艺期刊相比，《长风》首先没有关于民族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论文。它虽然提倡学术，但对学术的追求仅限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研究，与民族主义没有直接的联系。其次它提倡的民族精神，偏重于传统的道德文明，虽然致力于激发民族意识，但真正具备民族主义文艺性质的作品为数不多。为此当时其他民族主义刊物的编辑还表示过不满。《前锋周报》的李锦轩就曾挖苦过编辑徐庆誉：“对于什么什么主义，恐怕还有点朦胧不专吧。……徐先生，希望你的长风果能如你所定的目标做去，别要羊头狗肉的藉着什么专家名家而走上反动的路上去才好。”⁷⁾

《长风》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中影响不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存在的时间很短。作为半月刊，从1930年8月创刊，到10月15日出版第5期，仅仅维持了两个半月。终刊的原因，在第五期的扉页《紧要启示》中写明“兹因编辑离京，一时无人负责，暂行停版。”⁸⁾由此可知，该刊实际编辑只有徐庆誉一人，有限的几位供稿者也多为徐庆誉周边的熟人。因此在研究民族主义文艺的论文中，这份期刊大多被一笔带过，对这份期刊上刊登的文学作品，更是无人关注。

2) 沈兹九在《长风》的文学创作与政治倾向

1930年，沈兹九以兹九女士、沈兹九女士、兹九为笔名在《长风》的1至5

7) 李锦轩，《给〈长风社〉》，《前锋周报》第28期(1930.9.28.)，第116页。

8) 《长风》第5期(1930.10.15)，扉页。

期先后发表了7篇作品，其中文学创作6篇，社会专论1篇。6篇文学创作体裁多样，有小说3篇、剧本2部、散文1篇。具体情况如下表。

期数	题目	笔名	体裁	主题
第1期	《活的机器》	兹九女士	小说	反帝
第2期	《二重灾》	兹九女士	剧本（两幕剧）	反帝
第2期	《在租界上的电车里》	兹九	散文	批判国人崇洋媚外
第3期	《第十八代姨丈夫》	兹九女士	小说	反共
第4期	《女青年努力的方向》	沈兹九女士	论文	提倡妇女独立
第4期	《共“义”党》	兹九女士	小说	反共
第5期	《石达开》	兹九女士	剧本（独幕剧）	赞扬民族历史人物

小说《活的机器》和剧本《二重灾》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帝国主义。前者讲述了去日本做劳工的浙江农民被工头剥削，被日本工人殴打，甚至在关东大地震后无故遭到日本暴民的屠杀。后者通过纺织厂女工陆秀珠一家的悲惨遭遇，控诉了日本技师和西洋水兵对中国人的践踏和凌辱。两篇作品分别以日本和中国为背景，展现出1930年代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中国人备受欺辱的社会现实。

散文《在租界的电车里》以简短的篇幅描绘了上海租界电车上几个洋奴崇洋媚外的丑恶嘴脸。表现了作者对国人中自甘堕落者的痛惜和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

独幕剧《石达开》以历史人物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仗义疏财感动了强盗的故事，赞扬了石达开的博爱精神。从历史人物的光辉事迹中寻找民族精神，激起民族自豪感是民族主义文艺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之一。

专论《女青年努力的方向》作为第4期“青年问题专号”的一部分，对一些在精神上依附女性的女性提出了批判，号召女青年不要拘泥于家庭，要与男性共同创造社会价值，关心政治，为恢复女权而努力。从这里可以看出沈兹九早在1930年就开始关心妇女解放问题。

小说《第十八代姨丈夫》和《共“义”党》则表现出明显的反共倾向。《第十八代姨丈夫》中通过一个共产党员入狱后写给妻子的信，忏悔了自己通过榨

取工友，敲诈资本家维持阔绰的生活，接着又控诉“我们的同志中，这种人多着呢！……什么为无产阶级谋利益，哪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受金钱和权力的诱惑？可是他们偏要花言巧语，来笼络我们这些有血气的青年。”⁹⁾作者把共产党员塑造成虚伪狡诈、表里不一的形象，同时指出很多青年并不了解真相，是被诱惑才加入了共产党。《共“叉”党》叙述了偏僻乡村白水圩的几个无知农民被共产党员诱骗，以为可以拿到赈灾款，就在不知名的文件上画押，结果被当做共党分子抓进牢狱。面对县长的审讯，这些农民连共产党为何物也不知道，还听成了共“叉”党。作者批判了共产党利用农民的无知将他们玩弄于鼓掌。同时也同情被欺骗的农民，主张对他们进行教化。

沈兹九在日本留学时所学专业是艺术，回国后也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但是从沈兹九在《长风》发表的作品可以看出她关注的焦点不再只局限于教育、艺术，而是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并试图寻找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出路。

纵观沈兹九一生，从政治倾向上看，毫无疑问她是左翼人士。早在1939年，沈兹九就在重庆由邓颖超、钱俊瑞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照当时邓颖超的要求，数十年来她一直没有对外披露自己的党员身份。¹⁰⁾1946年，沈兹九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此后一直以民主党派人士的政治身份参与国家建社与社会活动。

1930年代左翼作家或者思想左倾作家在右翼民族主义文艺期刊上发表作品并不是个别现象。例如洪深、鲁彦、张露薇、何其芳、何家槐就曾在《文艺月刊》上发表过作品，欧阳山、白薇、柔石也曾在《现代文学评论》上发表过作品。张大明就曾指出“除左联的顶尖人物，新月派的主力，论语派的林语堂，北平的周作人、废名等而外，《小说月报》群，《现代派》，包括《水星》《文学季刊》众生，更有大量新登上文坛的作者，都给三民主义文艺和民族主义文

9) 《第十八代姨丈夫》，《长风》第3期（1930.9），第81页。

10) 沈兹九直到1985年才披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因为邓颖超在介绍她入党时告诉她：“如果有人问起你我是不是党员，你就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沈欣生，《怀念姑妈沈兹九》，董边编《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第200页。

艺的刊物供过稿。”¹¹⁾因为1930年代各种阵营的杂志和作家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存的局面。一方面“左联”是一个庞杂动态的组织，成员进出比较自由，作家在投稿时就更加自由。甚至有一部分作家迫于生计，选择稿酬较高的右翼期刊投稿。另一方面，右翼文艺阵营中既有像《前锋周报》《前锋月刊》这样政治色彩浓郁，比较激进的期刊，也有像《黄钟》《文艺月刊》这样相对去政治化，比较温和含蓄的期刊。后者为了刊物的质量和销量，乐于为各种背景的作家提供发表作品的机会。

尽管左翼或左倾作家在右翼期刊上发表作品并不少见，但沈兹九的情况则更为特殊。《第十八代姨丈夫》和《共“叉”党》这两篇作品都将共产主义思想视为毒瘤，强调了共产党的煽动性、蛊惑性，批判了共产党员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由此可见，1930年为《长风》撰稿的沈兹九还没有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当时的沈兹九是思想右倾的知识分子。目前在研究沈兹九的学术成果中，还没有学者关注过她发表在《长风》上的作品，也没有人注意到沈兹九曾经抱有的右倾政治倾向。

沈兹九为《长风》撰稿，最直接的原因是当时《长风》的实际主编人徐庆誉就是沈兹九第二任丈夫。沈兹九一生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她本人就是一位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者。第一任丈夫去世时，沈兹九只有21岁。在父亲的支持下，她勇敢地冲破了夫家为她准备的安逸的牢笼，选择了去日本留学。

1926年，她学成归国后在杭州等地任教。当时虽然有不少新女性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但社会风气仍然十分保守。沈兹九回忆道“归国后，在杭州教书，家庭以及社会上，对于我的行动，依然十二分的注意。他们对于一个小寡妇，总是另眼相看，似乎我的一颦一笑，都含着不合理似的。只是都流言着我要再嫁了。我想：你们以为我要嫁，我真的嫁给你们看看，看我推翻那节妇牌坊吧！这样凑巧来了一个对象，不久我们就结婚了。”¹²⁾这个对象就是徐庆誉。沈兹九

11) 张大明著，《主潮的那一面-三民主义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3页。

12) 沈兹九，《娜拉座谈会》，董边 编 《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第236页参考。

在杭州女中执教时结识了来此演讲的徐庆誉。1929年，沈兹九随徐庆誉来到了南京。¹³⁾《长风》的大部分稿源来自徐庆誉圈内友人。颇有才气的沈兹九作为徐庆誉的妻子，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长风》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可以肯定的是，1930年之前，沈兹九在思想上是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和三民主义的。否则在考虑再婚对象时，也不会选择正统国民党文人徐庆誉。实际上，沈兹九直到1947年双十节还撰文纪念中华民国的诞生，文中将中华民国比喻做“宁馨儿”和“要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健儿”，她痛斥了“窃国大盗”袁世凯和今天结党营私的“独裁武夫”，坚信只要人民成为民国的主人，民国就一定能抢救回来。¹⁴⁾字里行间表达了对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的热爱和支持。

沈兹九出生于浙江德清，少年时在杭州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求学。1926年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先后在母校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当时改名杭州女中）、江苏松江女中，南京汇文女中执教。她的生活范围一直在江浙地区。这里地处沿海，工商业发达，经济和教育水平也比较高，很多知识分子较早地了解 and 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北伐都持支持态度。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始具有代表中华民国全国性政府的气势，同年，以美国为首，世界各国也陆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北伐胜利结束。至此，从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的大业。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自成立就是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弱势政府，但一直努力地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教等个方面建设国家，特别是为了备战与支持军事建设，尽力发展各项经济建设。1930年，身在首都南京的沈兹九耳濡目染的是正处在“黄金十年”¹⁵⁾上升期的国民政府。此时，国民党提倡的民族主义文艺也正在如火

13) 可惜的是这段婚姻并不美满。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性，她思想独立，有自己的人格见解，与大男子主义倾向严重的徐庆誉渐渐不合。沈兹九回忆“有一次为了某一件事而争论，他争不过，就气愤愤地说：‘女子不应多说话，多说话就是长舌妇。’这是多么辱蔑人的话啊！总之他希望我处处附和他，……我却不能。我不能自己没有灵魂。”性格与思想差异造成了夫妻间的裂痕越来越严重。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徐庆誉要回故乡湖南做官，两人便无条件的分手了。沈兹九，《娜附座座谈会》，同上书，第236页参考。

14) 沈兹九，《民国的诞生》，（原载于1947年10月9日《风下》第95/96期合刊）同上书，第315-319页参考。

如荼地进行。以上海、南京为中心，各种民族主义文艺社团和报刊不断兴起。在社会大环境和家庭小环境的影响下，尚未接触过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沈兹九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右倾的队伍中。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1927~28年国民党发动清党后，宣传与武力分党相结合。很多右翼或右倾知识分子不仅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持负面态度，更对清党失控后殃及无辜的惨烈情形心有余悸。于是谈共色变，人人都想与共产党划清界限，生怕自己被当作共党分子，遭到迫害。像沈兹九这样思想右倾的知识分子产生反共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随着局势的变化和沈兹九的个人经历，她的政治倾向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殖民地化迅速加剧。世界经济危机开始波及中国，帝国主义为了转嫁危机在中国倾销的工业商品，孱弱的中国民族工业再次遭到打击。农产品国际市场不断缩小，丰收成灾的畸形现象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崩溃。连年内战，战祸遍及广大农村，为了维持战争苛捐杂税又不断加重。南京国民政府治下刚刚稍有气色的中国社会再次陷入泥沼。曾经对国民政府寄以厚望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失望，同时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右倾的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一部分人左倾的现象。

1932年，沈兹九来到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该馆表面上党派色彩并不浓烈，但有一些共产党员参与了筹办事宜，同时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加入其中工作。沈兹九在与他们一起工作的过程，受到了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她从右翼逐渐转向左翼的过度准备期。1934年，沈兹九担任《申报》副刊《妇女园地》的主编后，共产党员杜君慧开始与她接触。沈兹九称她为“引

15) “黄金十年”是指1927至1937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1951年美国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在美国国会第82届报告中写道：“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与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尽管魏德迈所称赞的”黄金十年“并未得到海内外学术界一致赞同，过去中国两岸三地学者也各有所执，但这10年间政府和人民始终致力于经济建设，国家发展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确是不争之实。卓遵宏等著，《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六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页参考。

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老师。”¹⁶⁾通过杜君慧，沈兹九了解到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结识了不少党内同志，在创办《妇女生活》和开展妇女运动等方面得到了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这是沈兹九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起点。

1930年代，中国革命的历程已经由“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转向社会革命。文学思潮政治化逐渐替代了“五四”所开启的思想自由氛围。朱晓进指出在三十年代政治文化氛围和特殊的文学语境的制约下，很多作家或是主观上加强了政治意识，或是为环境所迫开始关注政治问题。因此与二十年代相比，三十年代作家的阶级意识、政治意识明显加强。¹⁷⁾受时代大环境的影响，作家以及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表现出自己的政治倾向。而这种政治倾向也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沈兹九的政治倾向“向左转”并不是个别现象。实际上，左翼文学的蓬勃发展正是很多作家思想向左转的结果，例如创造社的集体转向，南国社部分左转作家另成立摩登社等。

作家政治倾向的转变也不限于左倾。鲁迅在1930年3月3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演讲时就指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鲁迅认为中国的作家几乎都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作家与描写和服务的对象——无产阶级始终存在距离。接受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形成左倾思想很容易，但落实到实际行动则很难。

有学者这样描绘了1930年代“左联”之外的作家在时代大潮的影响下，政治倾向发生转变的面貌。“这一时期的‘左联’之外的作家无论在政治上与文艺上都具有不同倾向，本身也出于不断分化中：有的民主主义作家受到‘左联’巨大影响和帮助，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盟军；有的自由主义作家则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国民党（但又不同于专门致力于国民党党治文学的作家），与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着矛盾与斗争。”¹⁸⁾1930年代的文学场，因为“左联”的存在，左翼作家极具

16) 黄景钧，《风云岁月—沈兹九与『妇女生活』》，董边编《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第54页。

17) 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2-233页参考。

18) 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8

辨识度，而与之相对应的右翼或右倾作家、以及政治立场并不明确的自由主义作家群体则相对难以区分。随着作家思想的转变与摇摆，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品中可能呈现出或明显，或微妙的差异。左翼与右翼本来就是借用了政治概念。政治的左翼与右翼也没有固定的内涵，有时候代表激进和保守，有时候是革命与改良。两者既相反也相生，不能孤立存在。因此左翼与右翼之间也不见得都是那么泾渭分明。张中良就以蔡元培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蔡元培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参与了1927年4月的清党提案。但同时他也聘任鲁迅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甚至明知鲁迅参与发起左翼作家联盟，也没有中断这笔“干薪”。1932年，蔡元培还与宋庆龄、鲁迅等一道共同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与营救被特务绑架的左翼作家丁玲。¹⁹⁾可见1930年代的文学场，是丰富复杂而发展变化的场域。左翼，右翼和中间派，其实都是处于共生共处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沈兹九先右倾，后向左转的思想变化也不难理解。

3. 从《活的机器》看沈兹九对在日中朝劳工的关注

《活的机器》发表于1930年8月15日出版的《长风》创刊号，是沈兹九在《长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篇。这篇小说讲述了一批浙江破产农民去日本谋生，像“活的机器”一般任劳任怨，辛苦做工，却受尽欺辱，遭受着非人的待遇，最后还有不少人丧命于关东大地震后的种族屠杀。

浙东破产农民赴日做劳工、日本关东大地震以及震后屠杀朝鲜人和华人等事件都是当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事件。可惜由于地理局限，无法搜集到准确详尽的信息，因此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很难找到关于这些事件的痕迹。沈兹九的《活的机器》填补了该项空白，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这段悲痛的历史，

页。

19) 张中良，《左翼文学与历史背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2页参考。

发人深省。

1921~1926年沈兹九在日本留学期间，耳闻目睹了华工及朝鲜劳工被日本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惨状。特别当时在日本有很多华工都来自沈兹九的故乡浙江地区，使她更关注他们的命运。1923年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大地震，震后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屠杀朝鲜人和华人事件。幸运的是沈兹九当时恰逢暑假回国探亲，躲过了这场劫难。当她5个月后接到校方通知返校时，东京仍是一片瓦砾。而此时大地震后种族屠杀事件已被逐渐披露，身在日本的沈兹九可以获得更多更准确的信息。

由于种族屠杀的对象还有朝鲜人，为了更合理和自然地展开情节，作者设置了朝鲜劳工金桂生这个韩人形象。金桂生虽然只是次要人物，但是每次的出场都对推动情节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被刻画得鲜明生动。金桂生是以往韩人题材作品中尚未提及的韩人形象。在日劳工金贵生的形象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中韩人形象的图谱。

1) 浙东华工赴日的理由与在日境遇

《活的机器》主人公李小狗与哥哥李大狗兄弟俩都是勤劳踏实的浙江农民，守着父母留下的微薄田产辛勤耕作，也只能勉强度日。两人到了娶妻成家的年龄，原想婚后男耕女织，一定能维持生活。可是同族的长辈告诫他们如今农村出产的土布，根本没有销路，家家户户的织机都闲置着，娶妻后再生子，根本养不活。作者寥寥数语，刻画出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凋敝景象。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帝国主义国家大力开拓海外市场，资本大量涌入中国，打破了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这种变化虽然带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少数大都市的繁荣。但同时广大农村被纳入大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体系之中，逐渐失去自我调适的能力，处于依附性地位。江苏浙江地区本就地少人多，加上地处沿海，相对开放，小农经济的单一经营模式被打破以后，很多极度贫困的农民受利益驱使，由粮食改种经济作物。农村副业

一度空前繁榮，絲、茶、棉等經濟作物被廣泛種植。這似乎給農村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實際上帶來了更大的危機。因為經濟作物銷路單一，價格受控於國際市場，結果農民的命運都掌控在帝國主義的手中。當時的經濟學家這樣描述了浙江農村的經濟情況：“自一九二三年以後，因絲業失敗，浙江農村經濟，遂開始衰落，更經過一九二四年的江浙戰爭，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浙江農村情形，乃愈惡劣。一九二八年以後，浙江農村經濟總崩潰的悲運，乃以特別快的速度展開着，更經過了一九三一年上海一二八戰爭的影響，特別是一九三四年的大旱災，於是浙江經濟情形，乃整個破產。”²⁰⁾相對富庶的浙江農村也在帝國主義侵略，連年內戰和自然災害的重重打擊下徹底陷入破產的深淵，展現出農村作為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中的犧牲品逐漸沒落的必然結局。

對於浙江地區的破產農民來說，去日本當勞工是當時為數不多的擺脫窘迫生活的希望之一。地處浙江東南部山區的溫州、處州（今稱麗水）、瑞安、瓊海、青田等地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在1910年代後期到1920年代初，形成了頗具規模的東渡日本移民潮。據統計，1922年在日本的浙東移民高達5000餘人，占當時旅日中國人總數的30%。²¹⁾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快速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特別是裝卸、搬運等重體力勞動的工人。雖然日本政府一直禁止從事體力勞動者前往日本，但為了解決本土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曾在1917年放寬了中國勞工赴日的條件。內務大臣後藤新平向內閣會議提交了《關於解除中國人勞動者限制的提案》，提出在“僅限於戰爭時期”，“僅限於招募不到日本人勞動者的情況下”，“僅限三千人以下”這三個條件下允許中國人從事體力勞動。但是1918年，再次加強了對赴日勞工的限制。當時根據相互主義原則，日本政府給與進入日本的中國人免持護照或者國籍證明的待遇。但同時在第1號內務省令《有關外國人入國的规定》第2條中明確列出“喪失心智者、心智衰竭者以及貧困者等其他需要救助

20) 朱其華，《中國農村經濟的透視》，上海：中國研究書店出版，1936年，第77頁。

21) 鄭樂靜，《20世紀初日本排斥華工政策與旅日浙南華工群體》，《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5年3月第1期，第90頁參考。

的人”禁止入境。中国人如果想到日本做苦力，就会被认定属于“贫困者”而被禁止入境。

种种禁令并没能阻止浙东华工赴日的脚步，在上海和温州出现了专门包办赴日事宜的中介商，在他们的运作下，贫困的浙东农民伪装成小商贩进入日本，辗转在东京、大阪等地，主要从事挑煤工、挖土工、工厂工和杂工等工种。《活的机器》中李小狗和其他农民一起通过已经在日本站住脚的同乡张发贵牵线搭桥，带着青田石和雨伞到日本来贩卖，以及李家兄弟为了赴日租屋卖田筹集了一百多元的路费，这些情节正是当时浙东农民赴日途径的真实写照。

1920年起日本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2年以后，日本国内的兵工厂、造船厂等出现大量失业者。失业日本劳动者将怒火都转到华工身上。认为是工资低廉的华工夺取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于是日本各地相继发生了多起日本劳动者和华工的冲突事件。日本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社会矛盾，于1922年开始严格执行一系列排斥华工的措施，包括禁止华工入境和遣返华工。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又给浙东劳工群体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地震和震后的种族屠杀造成了大量劳工死亡，幸存者大多在10月底之前回国。当年死亡和被遣返的旅日浙东华工高达4700余人。至此，浙东旅日华工群体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沈兹九在小说中这样描述了中国劳工的在日本工厂的境遇。

这十个人，出乎工头意料之外的勤，会做，虽然他们不十分会讲日本话，这无关紧要，他们只有牛一样的做，早晨做到晚，普通工人休息的时候，他们也不休息，在他们想，要拿他们这许多钱，非这样不可，工头很喜欢他们，觉得他们简直是“活的机器”，只要你有所使，他总替你做。而且又可得每月百五十元的额外，他想再用些蠢牛来也好，他同李小狗说，再想添些支那工人，所以续来的更多了。日本工人，起码能够读报纸，因为他至少都受过初小的强迫教育。工头对于他们，自然不能为所欲为，他为一己的利益权威计，开除日本工人，换上了些他所谓活的机器，被开除的日本工人，并不恨工头，他们只恨那些活的机器。不应该来侵占他们的位子。有时候竟持械来寻衅毒打，他们不抵抗，被打伤了，他们自己医，唯一的土方，皮伤，用面粉一敷。伤了筋骨，吃碗红花老酒就好了。他们既不请警察验伤，也不要他们赔偿医药费。日本工人对于这种无抵抗主义，

简直也没办法，只好另找饭碗。一年以后那个厂里的粗笨工人，都是李小狗的同乡了，他们虽然受工头威压和日本人的侮辱，也无所谓，他们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安分守己。²²⁾

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些中国劳工的感情可谓十分复杂。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他们因为本性善良淳朴，勤劳肯干，拿到了高于中国的收入就任劳任怨，如同“蠢牛”一般，充当日本资本家的“活的机器”。又因为缺乏教育，无知愚昧，对于资本家与工头的严酷剥削浑然不知，忠心耿耿地为其卖命；对日本工人迁怒与毒打，竟然也不抵抗，不报警，一味忍耐。安分守己的中国劳工只希望以吃苦和隐忍换来能继续工作的机会，憧憬着能赚到钱，将来锦衣还乡。令人既同情他们的悲惨境遇，又义愤于他们的无知与愚蠢。此处也为大地震后发生虐杀事件埋下了伏笔。

浙东赴日劳工遭受着日本资本家和工头的严酷剥削，又被日本工人打骂，仍然甘之如饴地埋头苦干。那么他们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到底能赚到多少钱呢？

小说中中国劳工每日的工资仅有五角。因为奸诈的日本工头将每日一元的工资克扣了一半，中饱私囊。有学者考证当时浙东华工的日工资为2日元左右，比日本劳动者低20%~30%，挖土工日工资为2日元，但是被中国工头扣去70~80钱，实际所得为1日元10~20钱。工厂工月工资为40~50日元左右。²³⁾可见华工的实际所得不足2元。

郭沫若在写于1933年的散文《鸡之归来去》中详细提到了当时在日朝鲜劳工的工资，每天只有八角，工头还要扣两角，每天两三顿稀粥的食费要交两角，仅剩的两三角还要留到没有工可做时充当食费。别说养家，就是糊口都成问题，无异于卖了身的奴隶。²⁴⁾又有日本学者对此文进行了考察，发现1923年时朝鲜劳工每日最高工资为一元七角，最低工资一元，但是随着全球经济大萧

22) 兹九女士，《活的机器》，《长风》第1期（1930.8）第58~59页。

23) 郑乐静，同上文，第88页参考。

24) 郭沫若，《鸡之归来去》，金柄珉 李存光 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第四卷，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第115页参考。

条的来临，到1931年朝鲜劳工的平均收入下降了20%~40%，变成了郭沫若所记录的八角。²⁵⁾《活的机器》背景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发生之前，这里每日工资一元正好印证了上文学者们的考证。可见这个数字并非作者杜撰。

根据郭沫若散文中的算法，李小狗与同乡们每日五角的微薄的收入在日本是难以维持生计的，但是他们吃的是从故乡带来的玉米面，住的是最便宜的贫民窟，扣除房租、零用，如果每天有五角收入，一年可以结余一百五十六元。相比乡下做长工一年只有二三十元的收入，李小狗与同乡们居然心满意足的充当“活的机器”。

2) 关东大地震中被虐杀的朝鲜人与被“误杀”的中国人

1923年9月1日在日本爆发的关东大地震，震级达到7.9级，对东京、横滨等大城市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共有超过14万人遇难，建筑物损坏超50万栋以上。地震造成了灾区水电、交通、通讯全面瘫痪，信息隔绝，一时间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其中最大的谣言就是朝鲜人趁乱放火、抢劫、杀人、强奸，还往水井里投毒。甚至“关东大地震是朝鲜人在伊豆大岛上引爆炸弹造成的”这种荒谬说法也流传甚广。日本的报纸也推波助澜，刊登了针对朝鲜人的种种不实新闻。最后日本政府向全国宣称“朝鲜人在各地放火，欲达到其不逞之目的”，继而呼吁全国共同围捕“作乱的鲜人”。于是日本军警、民间团体自警团，以及流氓黑社会，甚至普通百姓也加入了围捕朝鲜人的行列。他们公然闯入朝鲜人居住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以残忍手段杀害。更有甚者成群结队在街头拦住行人，命令他们唱日本国歌，凡是不会唱或者语音不对的就视为朝鲜人，立即杀害。

此次针对朝鲜人的屠杀主要是因为日本吞并朝鲜以后，朝鲜人的仇日情绪和部分武装反抗愈演愈烈，1919年爆发了“三一运动”后，谋求独立的民族运动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地震爆发后，日本政府借助谣言，主导了针对朝鲜人的大屠杀，这也是对朝鲜独立运动的变相报复。这次关东大地震后的种族屠

25) 藤田梨那，《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的抵抗文学》，同上书，第九卷，第171页参考。

杀，死亡人数骇人听闻。据韩国官方统计，至少有6661名朝鲜人被杀，受伤者更是数以万计。这与日本官方宣布的仅仅几百人死伤的数字差距极大。至今，韩国政府、学界及民间仍难以平息对这一暴行的激愤之情，不断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并持续进行学术研究，揭露事件真相。²⁶⁾

《活的机器》这样描写了日本自警团四处捕杀朝鲜人，金桂生仓皇逃来求助于中国劳工的情形。

金桂生气喘喘地跑了来，口里说：“不好了！不好了！老李你救救我，救我。”小狗问他什么事，他低声说：“日本人要杀朝鲜人了，他们说这场大火是朝鲜人放的，说朝鲜人趁火打劫要谋独立，你想这奇怪吗？大家都逃难也来不及，还有谁来放火？老天又没告诉我们几时几日本要大地震了，使我们好预备乘机独立！”大狗插嘴说：“事情倒也奇怪，为什么地震以后会到处火烧？”“我想地下的自来水管震断，煤气流出来，又是十二点钟，大家正烧着饭，煤气触火到处烧了，你看这里附近没有烧，不是此地还没装自来水管的缘故？”桂生说完了，看看大狗。外面一阵：“杀朝鲜人，杀放火的朝鲜人……杀……杀。”桂生缩做一团说：“你们听，这是他们临时组成的保卫地方的青年团的叫声咧！”“杀……杀……朝鲜人……”又是一批走过了。²⁷⁾

作者通过金桂生之口有理有据地控诉了所谓朝鲜人放火说完全是无稽之谈。这不过是日本人打击朝鲜人的阴谋。在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对此抱着深切的同情。发生朝鲜人被虐杀的惨剧后，中国人也根本不相信日本政府的说辞。

小说中描写日本人追杀华工的场景时，作者特意写出了日本青年团的叫嚷的内容，“支那人同朝鲜人一样的，他们一定也有份，而且他们夺了我们的饭碗……也杀……杀……”²⁸⁾从而点明了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真正原因是他们认为中

26) 야마다 쇼지 지음, 이진희 옮김, 《관동대지진 조선인 학살에 대한 일본 국가와 민중의 책임》, 서울:논형,2008년, 제65페이지, 제100~105페이지, 제190~202페이지 참조.

27) 兹九女士, 《活的机器》, 第62页。

28) 兹九女士, 《活的机器》, 第62页。

国劳工抢夺了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这是日本工人伺机报复。这也与前文日本工人寻衅殴打中国劳工形成呼应。

关东大地震后虐杀朝鲜人及华人的消息传出后，日本政府先是对杀害华人一事矢口否认，声称华人是在动乱中被当做朝鲜人遭到误杀，但当时华人与朝鲜人分别居住在自己的社区，且衣着、发型也大不一样，所以误杀的借口完全不可信。中国留日学生和幸存华工陆续回国，向国内同胞及全世界披露了日本人的恶行后，日本政府仍然只承认是地震时朝鲜人暴动，军警在维持秩序时误伤了华人。1924年1月，中国外交部就此事件与日本外交部进行的交涉中，提交的被害人数共560人。如此惊人的数字让日本政府所谓“误伤”的谎言不攻自破。近年来，随着调查的推进，被害人数还在不断增加。1990年日本学者仁木美子赴中国温州查访，在温州学者的协助下，根据各报纸以及中国驻日公使馆抗议照会所附属调查表、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抗议照会所附调查表、温州旅日同乡会调查表与查访中新发现遇难华工，统计出被害人数共716名，死者622名，失踪11人，负伤88人。²⁹⁾

关东大地震发生后，就在日本极端分子残忍屠杀华人的同时，中国国内的民众却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开展了救援赈灾活动。尽管当时中日外交齟齬不断，但是中国民众震惊于受灾情况之惨烈，官方与民间马上开展了救援赈灾活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北洋政府即派员到日本大使馆慰问，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与驻神户总领事急赴灾区调查慰问。在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况下，向日本援助20万元。同时通电全国，号召各政党和社会各界捐弃战争前嫌，暂停抵制日货，捐款捐物。各地绅商团体组织积极开展各项赈济活动。全国南北各大城市都成立了救灾团体，商界、教育界、演艺界纷纷筹款筹物。9月12日，轮船招商局的“新铭轮”就满载着上海社会各界捐助的物资抵达了神户港。这是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收到的首批国外救灾物资。同日，中国红十字救护队作为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携带现款两万元，药品十余箱也抵达神户。据统计，赈灾

29) 马红艳，《关东大地震期间虐杀中国人事件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第17页参考。

期间共有2100多个民间团体以及个人捐款，捐款总额达到50多万元。³⁰⁾

10月，屠杀华工的消息传到中国，国内掀起轩然大波，民众愤怒，一度消退的排日运动再次高涨。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抗议，要求中国政府迅速与日方交涉。然而因为当时中国正处多事之秋，国力衰微，北洋政府担心如果深究事件真相，政府有可能难以平复民众的愤怒，导致进一步混乱。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不愿与日本政府关系僵化。当时的中国军阀政客严重依赖日本政府的资助，北洋政府段祺瑞仰仗日本的“西原借款”，东北军阀张作霖依赖日方军事、经济援助。孙中山等民主人士为了筹备北伐也多次与日方协商，希望得到日方支持。因此，虽然在民众的压力下，北洋政府外交部派王正廷、刘彦、沈其昌等人赴日调查，但受上述诸多制约因素的影响，中国政府在交涉过程中，始终态度软弱，委屈妥协，并未极力要求日方彻底追查真相。日本方面更是秉持拒不承认方针，态度坚决。最后在日方给出含混其词的答复，及数目可怜的赔款后，中国政府顺水推舟，在未能探明真相的情况下，对事件的官方调查不了了之。

在国际与国内局势都剧烈动荡的1920年代，关东大地震后日本人种族屠杀事件虽然骇人听闻，但是其他更加惨烈的事件与残酷的战争也在不断发生，加之此事发生在日本，受地域局限性影响，它并没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留下鲜明的痕迹。沈兹九作为当时留日的中国学生，又作为被害华工的同乡，写下这篇《活的机器》关注了浙东在日华工这个被忽略的群体，记录下他们被剥削的血泪史和被屠杀的惨剧，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也为后世留下了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字记录。

3) 新发现的韩人形象金桂生

中韩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交流频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有关韩人和韩国的文学作品。在非文学因素的影响下，相关研究中断了多年。

30) 梁瑞敏，《日本关东大地震与中国朝野的救援》，《河北学刊》，2011年7月，第31卷第4期，第90~91页参考。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韩两国学者分别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重新启动了关于韩人题材作品的研究。目前在中、韩、日三国学者的努力下，该领域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果。遗憾的是，在韩人题材作品研究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右翼期刊的相关文献发掘一直出于滞后状态。实际上，19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作家群体是最早创作韩人题材作品的作家群。但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大量右翼期刊被湮没在历史中，包括韩人题材作品在内的许多有价值的内容亟待整理和发掘。本稿讨论的《活的机器》就是以往韩人题材作品研究中从未被提及的一篇。

韩人形象金桂生在小说中一共出场三次。除了结尾处在地震后被日本人追杀时，前来求助中国劳工朋友以外，前两次都是以帮助中国劳工的“同路人”形象出现的。

第一次是张发贵为自己带来的十来个同乡没有生计发愁，去找师傅想办法时，却发现师傅已经被日本妻子谋财害命。正在义愤填膺时，朝鲜工人金桂生赶来告诉张发贵，中国同乡卖石头时被人污蔑偷东西，遭到日本人的殴打，幸好自己路过上前赔礼解了围。当得知张发贵的苦恼后，金桂生又主动介绍这些中国人到工厂做工，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这里还简单交代了金桂生与张发贵熟识的原因。原来金桂生曾经在中国上海的日本纱厂做工，学会了中国话。作者这样安排，可能是确实在日本碰到了有类似经历的朝鲜人，也有可能是出于情节需要，进行的合理设计。无论如何，这使得朝鲜人金桂生与中国劳工之间不管是进行语言交流，还是产生友谊和精神共鸣都显得合情合理。

金桂生第二次出场是中国劳工李小狗看到同乡们沉迷于日本妓女的温柔乡，苦心劝说也无果。适逢张发贵外出做生意，心急如焚的李小狗只好去找金桂生商量对策。金桂生虽然束手无策，但仍然一边安慰李小狗，一边出谋划策。

前后三次出场用不多的笔墨刻画了鲜明生动的韩人形象金桂生。金桂生不仅热情仗义，而且知进退，懂得变通，他积极上进，平时看书读报。他帮助张发贵和他的同乡并不是为了谋私利，而是出于对与自己一样处于弱势的中国人的同情和友好。在沈兹九的笔下朝鲜人金桂生虽然与张发贵等人国籍不同，但

是相同的被压迫的处境使他们形成了天然统一战线。小说并没有交代金桂生的结局，但是从中国劳工死伤惨重的状况也可以推测，金桂生很有可能也遭到了屠杀。

金桂生作为新发现的韩人形象在现代文学韩人题材作品中具有一定的意义。首先金桂生是一个纯粹的工人形象，为韩人题材作品的人物画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类型。在中国现代文学众多的韩人形象中，最多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是各类革命者和爱国志士的形象，特别是民族主义文艺作家的韩人题材作品中，出于民族主义文艺的宣传需要，所有的韩人形象都是革命者和爱国志士³¹⁾。金桂生是民族主义文艺期刊作品中唯一一个非革命者的工人形象。

在非右翼作家创作的韩人题材作品中也出现过具备工人身份的人物，例如《佩佩》³²⁾中的朝鲜少女佩佩就曾经是中国纱厂的女工，但是当工人只是她的一段生活经历，佩佩后来成长为没有国界的女战士。再例如《一格高丽人格日记》³³⁾中的高丽人朴家里表面上也是一个上海工厂的工人，但实际上是日本人的奸细。而金桂生既没有双重身份，其身份也没有发生变化。不管是在中国的日本纱厂做工，还是在日本本土当劳工，他始终是一个单纯的工人形象。这是以往发现的韩人作品中所没有的新类型。

韩人题材作品中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日本的有好几篇，登场人物类型有韩侨革命者，小商人和韩国留学生等。³⁴⁾但实际上当时在日朝鲜人绝大部分是劳工阶层。他们大多是1910年朝鲜被日本强制合并以后，被迫移居到日本的。³⁵⁾在

31) 张琳，《19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中的韩人题材作品研究》，《中国文学研究》，2016年11月第65辑，第54页参考。

32) 《佩佩》，短篇小说，作者戴万平，发表于《光明》创刊号（1936.6.10）

33) 《一格高丽人格日记》，上海方言小说，作者朴家里，初刊于《小文章》创刊号。（1935.4.10）

34) 宋锦章的《女人的血》、盛马良的《寒》分别刻画了在日本的韩侨革命者形象，陈达人的《没有祖国的孩子》讲述了在日本安分守己开店的朝鲜人被日本警察迫害得家破人亡后，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非厂的《一个“朝鲜人”》与冰莹的《一个韩国的女战士》刻画的是在日本的韩国留学生形象。

35) 朝鲜人东渡日本是一部充满心酸和悲惨的历史。朝鲜并吞并前的1909年，居住于日本的朝鲜人只有790人，1910年以后，日本通过在朝鲜实行“土地调查”和“米谷增殖计划”等一系列殖民政策，掠夺农民的土地，加速了朝鲜农民的破产。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在朝鲜强征劳动力，大

日朝鲜人大多在矿山、土木工程工地等条件恶劣，工作繁重的地方充当日本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在日本被视为二等公民，地位低微。金桂生辗转于中国、日本工厂做工的经历，正是当时破产的朝鲜农民艰难求生的真实写照。

其次，金桂生是中国现代文学韩人题材作品中第一个关东大地震后虐杀朝鲜人事件中的韩人形象。在其他韩人题材作品中虽然提及到关东大地震，但都是一笔带过，例如台静农的小说《我的邻居》和郭沫若的散文《鸡之归来去》。从这些只字片语可以了解到该事件在中国已经广为人知，但是以此为背景塑造的韩人形象金桂生还是第一个。

最后，金桂生作为朝鲜劳工，热情无私地帮助了中国劳工，在危急时刻也去求助于中国朋友。这种朝鲜劳工与中国劳工的友好互助关系具有双重意义。既可以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解读成同在异国他乡谋生存，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弱小民族之间的联合互助。也可以从共产主义的角度解读成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对抗和推翻资本主义。前一种解读符合该小说发表的刊物《长风》的民族主义文艺性质。后一种解读似乎暗示了作者日后向左转的政治倾向。

实际上，沈兹九的这篇《活的机器》关注的焦点是在日本被剥削和被虐杀的朝鲜劳工和中国劳工，她批判的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说这是左翼与右翼共同的敌人。有学者指出“与五四反封建的思想启蒙主题相对照，三十年代文学的主题更多地是围绕着‘资本主义’来展开的。”³⁶⁾可见，不论是左翼文学还是右翼文学，包括处于中间派的自由主义文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时代的共同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沈兹九在《长风》发表的作品中有两篇出现了资本家形象，小说《活的机器》和剧本《二重灾》。这两篇作品中的资本家都是日本资

量没落的朝鲜农民被迫背井离乡，东渡日本。在日朝鲜人人数急剧增加，到1923年，达到80415名。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人已经达到200多万名。郑信哲，《在日朝鲜人历史及其现状研究》，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24页参考。（另据日本学者统计的数字是1923年在日朝鲜人多达136,557人。야마다 쇼지, 앞의 책, 제69페이지 참조.)

36) 王晶，《『文艺月刊』(1930-1941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17页。

本家，而不是中国民族资本家。民族主义文艺作家试图通过回避对民族资本家的负面描写来弱化左翼文学强调的阶级矛盾，同时为了突出民族矛盾，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

4. 结语

1930年政治倾向尚未向左转的沈兹九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响应国民党提倡的民族主义文艺是无可厚非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际遇的变化，沈兹九的政治倾向在日后逐渐左倾，最终成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她的政治转向也印证了风起云涌的一九三十年代，知识分子思想的复杂与摇摆。

沈兹九发表在《长风》这些创作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并试图寻找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出路。以真实事件为基础创作的小说《活的机器》关注了浙东劳工和朝鲜劳工在日本受剥削以及在关东大地震后遭到虐杀的悲惨境遇，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对其他民族劳工的残酷剥削与压迫，控诉了日本极端分子对朝鲜劳工、华工犯下的血腥罪行。《活的机器》同时塑造了朝鲜劳工金桂生这一韩人形象。金桂生是右翼韩人题材作品中唯一一个劳工韩人形象。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韩人题材作品中第一个纯粹的工人形象，而且是第一个以关东大地震后日本虐杀朝鲜人事件为背景的韩人形象。总而言之，这篇小说表现了沈兹九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底层劳工的人文关怀，也为惨痛的历史事件留下了文学性的记录。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相关的空白，具有文学与史料的双重价值。

沈兹九在《长风》的创作，映证了1930年代的文学场是由左翼文学、右翼文学和其他各类文学共同构成的复杂场域。他们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逐渐减少的今天，从原始期刊入手，了解文学原生态，特别是通过微观层面的期刊个案、作家个案研究，是研究1930年代文学现象和右翼文学的科学途径。

参考文献

- 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上海:中国研究书店出版,1936年。
- 董边 编《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
- 金平,《沈兹九的故事》,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
- 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 任宝根,《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征略》,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
- 야마다 쇼지 지음, 이진희 옮김,《관동대지진 조선인 학살에 대한 일본 국가와 민중의 책임》, 서울:논형,2008년.
- 张大明 著,《主潮的那一面--三民主义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吴俊、李今、刘晓丽、王彬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上海:上海人们出版社,2010年。
- 金柄珉 李存光 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
- 卓遵宏等著,《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六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 梁瑞敏,《日本关东大地震与中国朝野的救援》,《河北学刊》,第31卷第4期,2011年7月。
- 张中良,《左翼文学与历史背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 郑乐静,《20世纪初日本排斥华工政策与旅日浙南华工群体》,《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年3月第1期。
- 张琳,《19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中的韩人题材作品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第65辑,2016年11月。

郑信哲, 《在日朝鲜人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年。

王晶, 《『文艺月刊』(1930-1941年)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13年。

马红艳, 《关东大地震期间虐杀中国人事件研究》, 哈尔滨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16年。

《长风》第1~5期 (1930.8.15~10.15)

《前锋周报》第28期 (1930.9.28)

《中央日报·教育》(1930.9.21)

《华北月刊》第2卷第1期 (1934.8)

Abstract

A study of literary creation that Shen Zijiu published in the Right-wing journal
《Changfeng》 in 1930
- Focusing on the Korean-themed novel 《Living Machine》

Zhang Lin

In 1930, Shen Zijiu published seven works of literature in the Right-wing nationalist literary periodical 《Changfeng》. The themes include anti-imperialism, anti-communism, criticism of social phenomenon, and praise of historical figures, which often appeared in nationalist literature. This creation seems to be an attempt to find a way to solve social problems while reflecting social reality. In addition, we could see that her political trend at that time still belongs to the Right. Among them, the novel 《Living Machine》, which was created based on real events, depicts the miserable reality that Chinese and Korean workers in Japan were exploited by Japanese capitalists in the 1920s and even massacred by Japanese after the Great Kanto Earthquake. As an intellectual, Shen Zijiu recorded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form of literature, showing interest in workers. Therefore, it has both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values. The novel describes a character named Kim Gye-saeng, a Korean worker. Compared to other Korean images already discovered, Kim Gye-saeng is a character with peculiarity, which served as an opportunity to expand the case of Korean figur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 1930s Right-wing Literature, Nationalist Literature Movement, Shen Zijiu, Korean-themed works, 《Changfeng》 periodical, Right-wing Journal, 《Living Machine》

투 고 일 : 2022. 4. 10. / 심 사 일 : 2022. 4. 15. ~ 2022. 5.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2. 5. 20.

